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

语言的底层问题

Yuyan De Diceng Wenti

[苏联] B.И. 鲍尔科夫斯基等 著

陈伟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

语言的底层问题

Yuyan De Diceng Wenti

[苏联] B.И. 鲍尔科夫斯基等 著

陈 伟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的底层问题 / B. И. 鲍尔科夫斯基等著, 陈伟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61-2526-7

I. ①语… II. ①B. …②陈… III. ①底层 (语言接触) —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069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晓红
责任校对 安 然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4.5
插 页 2
字 数 82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陈伟教授翻译的《语言的底层问题》论文集，是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语言学界讨论语言底层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虽然此次讨论受到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些观点的影响，但语言学家们列出的许多例证以及讨论底层现象的一些理论仍然对我们今天研究语言接触和语言底层问题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此书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内部印刷，数量很少，许多读者希望进一步参考，但是当前已经很难再能够找到此书。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正式出版此书，我认为是英明之举，学术界之幸。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经过长期的语言识别，已经确定有 130 多种类型各异的语言，语言资源十分丰富。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可能与其他语言接触，并留下痕迹，中国的汉语及各种少数民族语言也不例外。语言的接触或多或少会相互影响，有的影响小一些，有的影响大一些。影响的大小会在语言的结构中反映出来。我们把它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浅层次的接触会引起词汇的借用，这种情况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里几乎普遍存在。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期，我们曾经将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作为一个专题开展调查研究，那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为了证明汉语在少数民族语言的丰富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证明中国的语言将走向融合，汉语将替代少数民族语言，这种想法当然是违背语言发展的历史规律的。但是该项研究的结果却大量揭示了语言接触的许多历史事实，为研究语言接触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开了一个好头。

随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更深层次的语言接触事实被大量揭示出来。一些语言由于长期接触，除了词汇的借用以外，进一步产生了语言结构的改变。我们观察到，由于词汇的借用，一些音位随着该词语在被借入语言中大量使用，使被借入语言的语音系统发生变化，增加了一些音位，出现了一些新的声母和韵母，有的引起声调的分化，增加了声调。还有的引起语法结构的变化，发生了词序的改变。羌语南部方言由于受汉语深刻的影响，词汇里有大量汉语借词（占词汇总量的 30% 左右），除了音位系统中增加了音位以外，语序也发生了改变：数量词修饰名词本来在中心语后面，出现了与汉语相同的语序，可以放到中心语的前面来。白族的语言更是一个通过深度接触，引起语言结构改变的典型例证。传统发生学分类都把白语放在

藏缅语族，而藏缅语族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SOV 型语言，但是白语的语序却改变为 SVO。类型学上一般认为，SVO 型语言是前置介词（preposition）系统，而 SOV 的语言是后置介词（postposition）系统。白语现在是前置介词系统，他是否在 SOV 向 SVO 转换的过程中，同时发生了后置介词系统向前置介词系统的改变呢？在藏缅语族语言里，像白语那样发生语序改变的语言还有克伦语。甚至有人认为，白语本来就是汉语族中的一个语言，因此他没有发生语序改变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汉语和藏缅语族是公认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他们的原始类型应该是一样的，后来发生了语序的改变，那么，是藏缅语族 300 多种语言后来都从 SVO 向 SOV 改变了呢，还是汉语后来像白语一样发生了 SOV 向 SVO 转换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还有别的解释。

语言接触的再一种形式是形成混合语。这一点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是不承认的。该书认为：“两种语言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其中的一种保存起来，保存它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使它能按其内部发展规律继续发展着。”（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8 页）但是，我国大量的语言接触事实说明，两种语言长期接触有可能产生第三种语言——混合语。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的《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版)一书收录了中国境内发现的5种混合语,他们是五屯话、倒话、扎话、五色话和唐汪话。其后,又在新疆发现了一种混合语艾努语,孙宏开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最近出版了赵相如、阿西木合作的专著《艾努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第15页认为,艾努语是“由屈折语类型的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波斯语和黏合语类型的阿尔泰语系的维吾尔语之间异源混融结构的一种语言”。最近在徐州召开的当代语言科学创新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杨永龙在题为《西北地区的涉汉混合语及其产生途径》(见《会议文集》2012年10月,第529—534页),又报道了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了甘沟话、河州话等混合语。该文还讨论了混合语与皮钦语(Pidgin)和克里奥尔语(Creole)产生的过程和异同。近几年来,语言接触形成的语言混合,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理论问题,诸如混合语的条件,混合语的特征,混合语形成的机制和过程,语言混合过程中的量化标准,史前的汉语是否是混合语……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也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的关注。

语言接触的另一种特殊形式是产生底层现象。苏联语言学界讨论底层问题的缘由仍然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阐述的一个观点,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语言因从失败的语言中取得一些词而使自

己的词汇丰富起来，但这一点并不削弱它，相反地，而是加强它。”（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8 页）这一点在本文集鲍尔科夫斯基的《开幕词》一文中，对“底层”一词所下的定义就可以完全得到证明。他说：“所谓底层，我们是把它广义地理解为‘战胜’语言中所吸收的‘战败’语言成分。”（见《语言的底层问题》，第 2 页）中国语言学界也是根据这一理论，讨论语言中广泛存在的底层现象。例如：

清朝统治中国近 300 年，满语文曾经在清代广泛使用于中原，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满语已经衰亡，人们在讨论满语在汉语中留下的底层时，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例证。这是近代发生的事情。

较早的事例发生在川甘地区。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对分布在四川、甘肃一带的白马人进行民族识别，大多数历史学家们认为白马人是历史上氐族的后裔。白马语是藏缅语族中的一种独立语言，在调查记录 3000 多个常用词中，有藏缅语族的同源词约 20%。白马语受藏语和汉语的影响都很深，各有 30% 左右的关系词。白马语还有一批与羌语的同源词，约占 8% 左右。但是白马语里仍然有一部分固有词，至今无法证明它们的来源。因为历史上的氐族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语言的片言只字。人们怀疑，这一部分人们无法找到来源的词是否就是氐族语言留下的底层。

更早的事情涉及原始汉藏语的讨论。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南岛语与侗台语、汉语的历史渊源关系被一些学者确认，尤其是西方学者斩钉截铁地认为这种同源关系是不可动摇的。但是能够证明同源关系的证据也仅仅数十个关系词，况且还有一大堆理论问题需要解释。那么这些关系词里是否能够证明为确凿的同源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是有人怀疑，南岛语与侗台语或汉语的关系词是南岛人离开大陆前，由于与汉藏语系语言的深度接触，留在南岛语里的汉藏语底层。这覆灭了语言学的证据外，还需要人类学、考古学等方面证据的佐证。可见，不管最后结论究竟如何，语言底层理论仍然是当前语言学界解释语言关系中一些悬而未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类似的大小例证在中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比比皆是。无怪乎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的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一次又一次地召开，会议文集一本又一本地出版。

本文集所讨论的问题，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随着语言接触引起的许多语言现象的讨论仍然众说纷纭，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梳理、归纳、澄清和深入。我认为，本文集的公开出版，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对于推动语言底层问题的深入研究，乃至语言接触、语言关系问题的研究将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孙宏开序于北京安贞桥寓所

2012年11月11日

译者的话

关于语言学中的底层理论问题，早在 15 世纪末叶就已经有人提了出来。后来，在 19 世纪 80 年代意大利的学者阿思科里的著作问世后，这一理论遂广泛传播开来，受到许多西欧语言学家的重视，并且多次在国际语言科学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和研究。1955 年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列宁格勒召开了学术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一理论问题，并为此出了专辑。本译文集就是根据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报告与通讯》1956 年第 9 期译出的。

在这本译文集中共收录有三个主要报告、开幕词和讨论总结。这些译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即已完稿，后因故未能发表。考虑到过去在我国对这一理论介绍得不够，熟知的人并不太多，而这些论文对于我们了解“语言底层”的理论概念、分析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形成的条件和后果，以及对我们研究语言的相互作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都有可参考之处；因此，经过重新校阅整理，发表出来，希望能对我国的语言研究工作有点用处。

目 录

开幕词	В. И. 鲍尔科夫斯基 (1)
语言学史中的底层理论	В. Н. 雅尔采娃 (7)
底层问题	Б. А. 谢列布连尼柯夫 (52)
论语言的底层	В. И. 阿巴耶夫 (97)
讨论总结	Б. В. 哥尔龙格 (121)

开 幕 词

В. И. 鲍尔科夫斯基

敬爱的同志们：

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认为，在我国最大的科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列宁格勒举行公开的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底层（*субстрат*）的理论问题，是合适的。

语言学研究所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相互影响的理解而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列宁格勒将能顺利地得到讨论。大家都已知道，在语言融合的情况下，通常总是其中的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着自己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并按照自己的内部发展规律继续发展；而另一种语言则逐渐丧失其特性，逐步衰亡。

而由于在苏联的语言学家中曾经广泛地流传过马尔在语言融合方面的错误观点，所以这次的讨论就更为必要。这样的错误观点，众所周知，不但是马尔有，国外的语言学界中（Г. 舒哈尔特、Н. 特鲁别兹柯伊、Э. 法列尔）也有。

毫无疑问，在语言学家们澄清和阐明许多问题时，考

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将一定能给予巨大的帮助；反之，在他们研究一定地区的居民更替的后果以及民族同化等问题时，底层理论对他们也是有意义的。

语言学家只有在相邻学科的学者帮助下，他的某些假设才能获得实际的根据，或者是被推翻掉。没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研究工作，底层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所谓底层，我们是把它广义地理解为“战胜”语言中所吸收的“战败”语言成分。

至于这些成分在战胜语言体系内部是否自成“体系”，或者它们从来就是被“胜利”的语言体系个别驯化了的、零散的借入成分，这仍然还是争论未决的问题。

在现代的国外语言学著作中，有三个术语被一些持有不同于马尔观点的，并认为一种语言必然胜利的作者所接受，它们是：

(1) 底层 “субстрат” [阿思科里 (Асколи) 从 80 年代起使用] —— “战败” 语言的成分，所谓 “战败” 语言是指掌握了外来者语言的当地土著居民的语言。

我们可以提出拉丁语在高卢和西班牙的胜利，斯拉夫语在巴尔干和捷克的胜利，突厥语在楚瓦什的胜利等来作为例证。

(2) 表层 “суперстрат” [瓦尔特布尔克 (вартбург) 1936 年提出的术语] —— 外来者的语言成分，这种外来者的语言已融合到当地居民的语言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当

地居民的语言则成为“战胜”语言。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法朗克人在罗马化了的高卢，诺尔曼人在英格兰，保加利亚突厥人在保加利亚的情况。

(3) 叠层“адстрат”[巴尔脱里(Бортоли)1939年提出的术语]——异族语言的成分，它们是在边界地区，在部分人种混合的情况下进入语言中的，并由此流传到整个地区(如：白俄罗斯—立陶宛，立陶宛—波兰，斯洛文—意大利等边界地区的语言关系)。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区分这三个概念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这三种类型的语言相互影响在语言方面造成的后果是否有区别？这正是有待于讨论总结来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争论最大的是第三个术语(адстрат 叠层)，以及我们还没有指出的第四个术语——边界接触(маргинальное контактирование)——后者意味着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是在没有任何人种混合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边界接触与叠层不同之处)。

关于上述几种概念之间的区别问题，是属于尚未研究透彻的一个问题；同样地，引起一种语言“战胜”另一语言的语言外部因素(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及语言内部因素(相近的程度、亲属关系、统一的程度、规范化)的问题，也是如此。

“战败”语言衰亡过程的阶段问题，也属于这类尚未研究透彻的问题之列。除了国外发表过有数几篇著作外，

我们能提出的仅有 Ю. Д. 捷舍里也夫的《论原先已有文字的语言、新有文字的语言和无文字的语言……的相互影响》一篇，这篇文章试图用高加索的语言材料来解决这一问题。

无论是在这篇文章中，还是在 Б. А. 谢列布连尼柯夫或 В. С. 拉斯脱尔古也娃的文章中，都提出语言的各个方面，其稳定性程度是不同的问题。

更加准确地阐明这一问题也是这次讨论的任务，而关于词法几乎完全不可渗透的一些结论就包括在这个问题之内。

讨论会的基本的和中心问题是：那种与人种混合无关的语言间相互影响所产生的语言后果同由于广义的底层（底层、表层、叠层）影响而产生的后果，两者有无差别？差别何在？

我们即将讨论的 Б. А. 谢列布连尼柯夫和 В. И. 阿巴耶夫的报告就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观点。

而对于既发生人种混合又产生语言间相互影响情况下的双重语言制的作用，则应当给以更加详细的说明，也就是说：

（1）在相当数量的居民并未彻底掌握两种语言的情况下，是否能有底层（表层）的影响？在尚未充分掌握另一种语言或只有少数居民操双重语言的情况下，可否有这种影响存在？

由于对苏联各民族语言所进行的研究，因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

(2) 根据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许多条件来看，操双重语言时期的长短如何？

(3) 在双重语言停止使用以后，底层是否还起作用？即“战败”语言能否保持和在什么范围内保持其言语习惯和发音基础？同时，渗入到语言内的句法结构还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呢？等等。

(4) 地名学是近年来几乎被遗忘了的一个领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Я. М. 艾捷林，К. К. 柴鲁伊卡，А. И. 波波夫尚在研究，但在解决底层问题方面，地名学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在“战胜”语言受到底层影响的情况下，关于语言各个不同方面（不同的词汇层、语音、构词法、词形变化、词组类型、简单句和复合句的结构，等等）的可渗透性的程度问题是应该给以更加明确的阐述的。

而关于底层理论是否已越出历史比较法的范围，或者它只是历史比较法在运用上的一种特殊情况，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Б. А. 谢列布连尼柯夫和 В. И. 阿巴耶夫两位的报告对这一问题也表示了不同的观点。

上述所要讨论的问题在 В. Н. 雅尔采娃、Б. А. 谢列

布连尼柯夫和 В. И. 阿巴耶夫三人的主要报告和 А. В. 捷斯尼茨卡雅、В. Г. 奥尔洛娃和 Е. И. 乌布良托娃各个事前有准备的发言中不可能全都得到充分的阐明。

我们期望，无论是在前述报告和发言中将要阐述的问题，或者是尚未引起应有注意的问题，都能得到富有成果的讨论。

请允许我号召出席会议的语言学家们、考古学家们、人类学家们、民族学家们广泛地、自由地交换意见，进行战斗式的批评，大胆深刻地解决所要讨论的问题。